

世界经济重心再度转移，中国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进一步扩大开放(二)

款。七十年以后，我们成立了亚投行，成员国必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，因为他们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成员。但是，之所以规定亚行成员也可以参加，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，以便为个别非主权经济体加入亚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据。

然后，**美国要求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，设置世界银行的股份，这跟当时在同时磋商成立的联合国的一国一票规则是不同的。在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下，美国实现了成为最大股东、担任行长、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三个目标。**世界银行成立以后，所有新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最大股东，都不能够同时做到这三点，亚投行是唯一的例外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能同时让美国直接掌控，这个机构就让给了欧洲

来掌管。因为世界银行当时的使命是帮助重建，虽然它没有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宏观监管影响力，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是很大的。

21世纪，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，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担当此事的。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，通过努力，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：中国是最大的股东，中国人担任行长，总部设在首都北京。

六十年代，亚开行成立的时候，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当时，台湾和香港加入了。日本何尝不想把总部设在东京。首先，美国开始是不同意成立亚开行的，最后达成妥协，美国支持成立亚行，条件是美日平起平坐，但日本还是象征性的多一股。因为这是亚开行，所以日本人当行长，但是总部不能设在东京。

当时，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地区相当发达的首都，还有就是伊朗的德黑兰。最后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通过努力，争取大家投票支持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为亚行总部所在地。伊朗一怒之下退出，没有参加亚行，以后由于政治原因，伊朗再也进不来了，就像当年苏联一怒之下，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，过了多年才重新进来。所以，**我们在任何国际场合都要冷静，都要理性，都要从长计议。一怒之下，难成大事。**

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是国际货币基金、世界银行、关贸总协定，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。这三大经济支柱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，因为它们都是遵循国际合作的原则，是按多边主义的原则来建立和运行的，通过协商来解决重大问题。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，我们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，但是加入以后，我们起了很积极的作用，获益良多，并且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**中国一再说明，我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，我们同样也是受益者。**

但是，这个国际经济体系是在七十多年前建立的，当时的

情况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。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形成了新的格局，诉求也不再一样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成了一个话题，很多国家提出了挑战：**是不是需要改革？能不能改革？应该怎么改革？由谁来改革？**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

第一、对现有的国际机构的一些运行原则，不进行改变行不行？这是肯定不行的。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，还是以美国、英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，是遵循他们所倡导的规则。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，从金融、工业基础、高科技等来讲，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。七十年以前建立的制度肯定不再完全适用于今天。

下面的问题是**怎么改？**先看发达国家，他们不一定没有动力去改革，问题是改革的最后得益者是谁？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。就像联合国的改革一样，很多国家都认为联合国要改革，安理会要改革，但安理会的成员国并没有就如何改革达成一致。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，有一点我认为**是要保留的，即一美**

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。改了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处，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前美元少，现在美元多了，为什么把这个规则改掉？现在的问题是，在一美元一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，发达国家也会有担忧：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了，发达国家的GDP相对少了，以后就没有发言权了。这就好像我们管理企业时，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，不顾及小股东利益，剥夺小股东的权力，最后企业只剩下大股东，是不可行的。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，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，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。

第二、七十年后的今天，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美国还是大股东，影响力当然很大。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，历来是欧洲人，所以欧洲也有更大的发言权。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，但是，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，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，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，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。其他国家则要推荐合适的人选竞争副行长的职位。我是中国第一人去竞争亚行



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